

周作人与宫本百合子

——从《鲁迅全集》注释之误说开去¹

长堀祐造 著
裴亮 译

论文摘要：周作人曾于 1951 年初在《亦报》上发表了《日本民谣》。该文不仅介绍了宫本百合子的战后作品《播州平野》，也言及了宫本百合子的丈夫、作为日本共产党领袖之一的宫本显治。而当宫本百合子于同年 1 月 21 日去世之后，他随即撰写了《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并同样连载于《亦报》以示追悼。笔者认为，这一系列文章的执笔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背景基础：一是周作人自五四时期以来对妇女问题所怀有的强烈关注；二是周作人在 1930 年代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文学评论》作家群体的交流。

此外，《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的刊载时期，正值共产党情报局对日共进行批判而引发的所谓 1950 年日共分裂的最高潮，彼时的宫本显治作为反日共主流派的国际派之指导者也正处于斗争漩涡之中。笔者认为，周作人是在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不断获得了关于日本政治局势信息的基础上，写下了这一组文章。与此同时，在新中国对自身待遇尚未完全确定的情况下，周作人在上述作品中谴责日本法西斯、言及宫本百合子和显治夫妇的深层意图，是值得引起充分思考的。而且，胡适在新中国建国前夕曾委托中间人劝说周作人南下避难。据周作人 1949 年日记的相关记载或可推测，其中间人很可能就是曾为陈独秀送终的前中共党员、彼时身为托派成员的何之瑜。

关键词：周作人、宫本百合子、共产党情报局对日共批判、1950年日共分裂、何之瑜、《鲁迅全集》

一、《鲁迅全集》注释之误²——“没有转向的二个”与宫本百合子

在日本战败六年之后，中野重治在《改造》杂志1951年第11月号上发表了《关于鲁迅（鲁迅について）》（译者注，本文所引日语文献均在译文后保留日语原题，下文同）一文，文中引述了鲁迅在1934年11月17日写给萧军·萧红二人的书简并这样写道：

关于鲁迅我至今已写过几次。也曾在众人之前当面谈论过。而在此又试图再度提笔来就鲁迅——而非别的旁人——写点什么，当真是提不起什么兴致。这是因为一想到鲁迅的事情，就会变得难以言表。鲁迅曾在1934年给萧军的信中写道：“中野重治的作品，除那一本³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了两个（藏原和宫本）。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坚硬。”1934年正好是我从监狱出来的那一年。我现在虽然不清楚这封信的执笔日期，但或许是写于我刚“转向”后不久吧？⁴

1 译者注：本文根据长堀祐造「周作人と宮本百合子『魯迅全集』注の誤りに触れて」一文译出，该文原刊『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中国研究』第12号（2019年3月）。在翻译过程中得到长堀老师关于相关历史背景与译文校订的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2 关于此问题，笔者在拙著《鲁迅与托洛斯基（鲁迅とトロツキー）》（平凡社、2011年）第10章第353页以及在同章节注释（44）中已有说明。因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展开论述，难免有若干重复之处。

3 指的是尹庚译《中野重治集》（上海现代书局、1934年3月）。收录作品包括《鉄の話》、《春先の風》、《花見と新聞配達員》、《わかもの》、《砂糖の話》。

4 此处引自《中野重治全集》第20卷（筑摩书房，1977年）。引文尊重中野本人意见，假名的使用也完全遵循此全集版本。另外，中野所说的自己的“转向”，根据《中野重治全集》第28卷《年谱》可以判断是发生于1934年5月26日的事情。

鲁迅这封写给萧军·萧红二人的书信，其实并非要谴责中野的“转向”行为。因就在紧接着上述中野所引片段之后，鲁迅继续写道“不过事情是要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指日本——长堀注，未明确说明之处下文皆同）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反而表达了对中野的同情。然而在中野看来，将“转向”正当化的行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伦理上的都不可行。故而对于很可能会被视为借鲁迅之权威来实现自我正当化的这一部分内容，中野并未引用而是予以了回避。

言归正传，本节所要讨论的既不是中野的转向问题，也不是鲁迅拥护中野的申辩，而是关于《鲁迅全集》针对前文鲁迅书信中提及的“只剩了两个（藏原和宫本）”这一说法所做的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分别于1981年和2005年推出过两个版本的《鲁迅全集》。可信度最高的这两个版本分别对此说法进行了如下注释：

【一九八一年版注】

藏原与宫本即藏原惟人与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参看320423信注①。宫本百合子（1899-1951），原名中条百合子，日本女作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员，著有《播州平野》等。

【二〇〇五年版注】

藏原与宫本 即藏原惟人与宫本百合子。藏原惟人，参看320423信注⑥。他于1932年被捕，1940年出狱。宫本百合子（1899-1951），原名中条百合子，日本女作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员。她是宫本显治之妻，曾多次被捕入狱不屈，一直坚持写作。著有《播州平野》等。

对此，笔者曾在拙著《鲁迅与托洛茨基（鲁迅とトロツキー）》第十章注释44中做过如下说明（〔〕内为笔者针对本文引用时所做的补充）：

2005年版《鲁迅全集》在该信的注解中把“两个（藏原与宫本）”中的“宫本”当作宫本百合子，正确的应是宫本显治。和中野比肩的两个非转向的无产阶级文学者，一般首先想到的是藏原惟人和宫本显治，而且鲁迅写这封信的1934年11月当时，这两人都在狱中且非转向〔藏原于1940年刑满出狱〕。而据《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新日本出版社，1981），将笔名由“中条百合子”改成“宫本百合子”是1937年10月的事情，虽然与宫本显治是在1932年2月结的婚（登记是1934年12月），但在1934年11月作为作家还是“中条百合子”而非“宫本百合子”。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也犯了同样的错误，甚至还有印刷错误。学研版《鲁迅全集》不知为何将原注正确地改为“宫本显治”，是译者注意到而做的修改吗？倘若如此，希望在译注中注明。关于此事〔中略〕丸山升的《鲁迅与鹿地亘》的注解16也有提及。⁵

或许2005年版只是照搬沿袭了1981年版的错误注释。但这一失误却是非常低级的，而且是只要对日本的左翼运动或无产阶级文学有一点常识性的了解，或者只要去查阅日本的相关资料就可以轻易避免的错误类型。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考，此问题本身正体现出1981年当时的中日关系，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当时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5 关于拙著中的此条注释，本文有两点补充：第一、根据《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新日本出版社，1981年）所收《年谱》，中条（宫本）百合子确实屡次被检举，1934年1月也曾被逮捕，6月被释放，和11月末以违反治安维持法等罪名被起诉逮捕的显治直到12月初才见面。鲁迅文中所说的“只剩了两个”的非转向者之一可以断定只能是宫本显治。第二、丸山升著《鲁迅和鹿地亘》（《鲁迅·文学·历史》所收，汲古书院，2004年）的注释（16）的全文如下：“《鲁迅全集》12卷，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566页。另外，关于此处‘藏原和宫本’，该《全集》作了是藏原惟人和宫本百合子的注释，在学习研究社的日译本《鲁迅全集》中则改为藏原惟人和宫本显治。中条百合子正式登记成为宫本百合子是在34年12月，在作品上也如此署名则是在35年以后”。拙著的注释根据《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所收《年谱》，将宫本百合子作为笔名开始使用的时间判定为1937年10月。丸山的说法根据不明。〔译者补注：本条注释的翻译基本参考了王俊文译长堀祐造著《鲁迅与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在中国》（台湾人间出版社，2015年）第十章第335页中相关条目的翻译〕。

宫本显治一直以非转向的状态，在战时大日本帝国的监狱中得以幸存。战后则在经历了所谓日共1950年的分裂之后，于1955年重返领导部门。他在1958年召开的第七届党员大会上就任书记长之后（此后相当于书记长的职位名称的变更问题在此先暂不涉及），进而成为了领导日本共产党的绝对指导者。在1960年初期的中苏论争中，因声援支持中国而使他在中国声名鹊起。如果中国和日本的共产党没有因为1966年3月毛泽东和宫本会谈的破裂，以及随后由于发动文革引起对立激化⁶而导致双方关系的完全断绝，这样的错误应该不会发生。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首先、《鲁迅全集》的编辑与注释的撰稿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知识缺漏；第二、如果两党之间的友好关系得以持续，则绝不可能看漏关于日本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注释中出现的笔误。

与下文将要论及的周作人在得知宫本百合子于1951年1月21日去世之后以文学家的身份和姿态做出了迅捷而恰当的反应相比，《鲁迅全集》的注释之误不禁让人感到二者之间的巨大落差。而这也正是本文要“旧事重提”的原因所在。

二、写《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之前的周作人

在1951年1月21日宫本百合子逝世后不久，周作人紧接着就分别于2月1号、2号在上海发行的《亦报》上发表了《宫本百合子（饭后随笔三六七）》和《宫本百合子 二（饭后随笔三六八）》⁸，表现出了他迅速的对应。但其实这两篇文章的执笔是有前史的。在正式介绍二文之前，不妨先来梳理一下宫本百合子生前周作人关于她的言说。

(1) 《佐藤女士的事》⁹

中日战争终战前夕，就在1945年7月15日刊行的《女声》月刊第4卷第2

6 中国共产党在文革中将“宫本修正主义集团”与“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日本反动派”并称，定为四大敌对势力。

7 日中共产党恢复友好关系是在1998年。

8 均收录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号上，周作人发表了《佐藤女士的事》，以追悼当年4月去世的佐藤（田村）俊子女士。《女声》是佐藤（田村）俊子在战争期间得到日本资金赞助后以“左俊之”的名义在上海主办的中文文艺杂志月刊，从1942年创刊一直持续至日本战败前夕。¹⁰编辑之一的关露¹¹希望为《女声》约稿请人来写一写故去的佐藤俊子的事迹，柳雨生¹²将此口信通过书信转告了周作人，《佐藤女士的事》一文正是周作人应此邀约而写的。周作人在文中介绍了“佐藤女士”的文学经历及其功绩，其中也顺带提及了宫本百合子，他这样写道：

佐藤女士本身在文学创作上尽了相当的力，这是很可以佩服的，正如与谢野晶子中条百合子在诗歌评论上一样。

周作人在此表彰了佐藤（田村）俊子、与谢野晶子、中条百合子等日本女性文学家所作出的功绩。这里所说的中条百合子自然就是指宫本百合子。正如前文所述，中条百合子在1937年和宫本显治结婚之后，就已将笔名改为宫本百合子。

此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该文的撰稿时期以及文中对宫本百合子的言及。此时正值日本战败前夕，而宫本百合子的丈夫即宫本显治，当时作为日本共产党领

9 收录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

10 参见赖怡真《中国雜誌「女声」文芸欄再論—上海で形成される宮沢賢治テクスト》（《九大日文》24、2014年、九州大学日本語学会）、《近代日中关系史人名词典》（东京堂出版社，2010年）。

11 1907～1982。作家，中共党员。在日本占领下的上海作为中共的情报员接近日本文学家，参与佐藤（田村）俊子主办的杂志《女声》的编辑工作。而且冒着身份暴露的危险参加了在东京举办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家大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甚至在新中国，作为间谍的经历曾被误认为是“汉奸”而遭受批判，一度过着十分艰辛的生活。1982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出台了关于关露“平反（名誉恢复）”的决定，苦于病痛的关露于12月自杀而死。详情参见岸阳子《夜に啼く鳥—大東亜文学者大会と一人の中国女性作家》（《中国知識人の百年—文学の視座から》）所收，早稻田大学出版部，2004年），以及岸阳子论文所引萧阳文著《一个不该被遗忘性的女作家关露》。

12 1917～2009。别名柳存仁。文学家，汉学家。因在日中战争中为日本方面提供协助，参加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以文化汉奸之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后赴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成为了国际上有名的汉学家，也曾于早稻田大学进行讲演。关于柳雨生在战争期间的详细活动，请参照杉野元子《柳雨生と日本—太平洋戦争時期上海における「親日」派文人の足跡》（《日本中国学会報》第55集，2003年）。

导人正因违反治安维持法而在网走监狱服无期徒刑。周作人当然对此情况是知晓的。即便如此，他还是将宫本之妻亦是作为著名无产阶级文学女性作家的宫本百合子，和佐藤（田村）俊子、与谢野晶子的名字在文中一起并举，这一举动还是颇有深意的。而之所以提及不写作“宫本”百合子而冠以旧姓“中条”百合子，其原因可能在于主要聚焦于她初期的文学功绩，同时也可视为在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政权下周作人对社会形势有所顾虑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似乎也可以推测认为，周作人此时已经察觉到败势明显的日本即将投降，故而敢于在文中提及中条百合子之名（波茨坦公告即是在该文刊载两天后发表的）。

(1) 《日本民谣（饭后随笔三四六）》¹³

接下来要讨论的事情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彼时，因日本战败后曾被国民政府以“汉奸”之名起诉而服刑的周作人获释之后也回到了北京。在1951年1月10日发行的《亦报》上周作人发表了一篇短文《日本民歌》。该文实际上是针对宫本百合子1947年出版的小说《播州平野》¹⁴所写的书评和介绍性短文。由于该文涉及到了宫本百合子与宫本显治二人的关系，以及为了展开论述的需要，现转录全文如下：

从友人那里借来一册日本小说，书名《播州平野》，宫本百合子著，一九四九年出版。她是现代日本的进步作家，本姓中条，在苏联留学，嫁给宫本显治，显治以共产党关系被判无期徒刑，至日本降服，始得出狱，已被监禁十二年了。这小说便描写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以后，石田广子为迎接重吉出狱，往来于母家夫家及东京之间，所见家庭社会上的情形，对于日本战败悲喜交并，很有意思。由著者看来，“这大（军用）工厂因了轰炸而破坏得

13 收录于《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1卷。

14 初版本为1947年4月由河出书房刊行。1949年7月作为小山文库第16册由小山书店再度刊行。周作人此处所说的应该是后一个版本。

踪影全无，无宁认为趋向整理的第一步，也无不可。”就是在一般民间，也都厌战，等到投降发表，大家倒反而觉得透过一口气了。第十二章末节说¹⁵：

在那地方从五月时起街上流行着这样的歌云¹⁶：

日本是好的国土，花的国土，

七月八月是灰的国土，

九月十月是别人的国土。

每一辆公共汽车上，必定有一个宪兵搭乘着跑路。可是在这街路上，这首歌流行着，歌唱着。因了在生活上被套上去的愚弄而生的愤怒，使得各人对于这歌词的辛辣引起了同感。

其时还是在发表投降之前，于此可以见人言之可畏，够得上与中国古时所见的童谣相比了。（写好后见齐公文¹⁷，知此书已有中国译本¹⁸了。）

《播州平野》中的主人公石田广子及其丈夫重吉的人物原型就是宫本百合子和宫本显治夫妇。在1951年1月这个时期，周作人对宫本显治和百合子夫妇的认知在此处显而易见。然而就在翌月，周作人就不得不面临要为宫本百合子撰写悼文的局面。

15 () 内的“军用”是周作人的译注。《日本民谣》一文是在小山文库本《播州平原》刊行的大约半年之后发表的。

16 周作人此句的汉语译文与原文位置有所差别。“在那地方”与“街上流行着这样的歌云”在日语原文中是出现在歌词之后，周作人在翻译时将其提前了。

17 “齐公”是指当时在《亦报》的“随笔”栏目中发表文章的齐甘，和周作人关系亲近。详情请参见巫小黎所著《周作人〈亦报〉评点〈十八春〉》（《佛山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月，31卷3期）。此条注释得益于周作人研究专家早稻田大学商学学术院小川利康教授的指教。

18 检索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可知，《播州平野》的中文版为沈起予译，由文化工作社于1951年出版。但至于周作人所说的不是指这件事，从本文的发表时间与该译作的出版时间来看较为微妙。如果周作人所说的不是已出版的中文译本，而是指中文译稿的形态或者说是准备出版的话则不存在矛盾。

三、《宫本百合子（饭后随笔三六七）》与《宫本百合子 二（饭后随笔三六八）》

就在周作人写完《日本民歌》不久之后的1951年1月21日，宫本百合子因罹患败血症，在年纪轻轻的52岁就不幸去世。周作人在于同年2月1日、2日发行的《亦报》上发表了《宫本百合子》与《宫本百合子二》，迅速对此事做出了反应。在此转录两篇短文全文如下：

《宫本百合子（饭后随笔三六七）》

据新华社消息¹⁹，日本进步女作家宫本百合子于日前逝世了。她是日本革命者兼小说作家，关于她的生平事业，要别人来介绍，我没有这些材料，现在只就手头所有她的一册早期和晚期的作品²⁰，简单地来说几句话。

她的早期作品是用中条百合子的名字发表的，因为她本姓中条，后来嫁了宫本显治，才改了姓。日本条字的姓上加数目字或东南西北中的，大抵出于贵族及士族，中条家也是个大地主。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萌芽》出版的时候，正在学习院女子部肄业²¹，那是一个特殊阶级的学校。那小说也是当时经文坛名人坪内逍遥的推荐而出现的。我所有的是第二部集子²²，题名《穷人的一群》，一九一七年出版，作者才十九岁，那《一个萌芽》的出版或者

19 1951年1月26日刊行的《人民日报》上以“新华社24日电”的形式报道了宫本百合子去世的消息，并配发了中华全国文艺家协会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发送给日中友好协会的唁电。此外，于两日后的28日发行的该报刊载了相当长的追悼文章《超过大海和火网的悼念——悼日本人民战士宫本百合子》。正如下文所述，从《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可以推断周作人当时看过这篇《人民日报》的报道。

20 从《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二》的内容看，周作人所言宫本百合子早期、晚期作品各一册应该分别是《貧しき人々の群》（玄文社，1918年）和《播州平野》（河出书房，1947年或小山书店的1949年版。但正如前注（13）所示后者的可能性更大）这两本。

21 据《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所收《年谱》记载，《一つの芽生》1918年1月刊载于《新日本》。次月由新潮社推出了《一つの芽生》的单行本。百合子1916年春天曾一度进入日本女子大学英语预科学习，但一个学期后就退学，之后无迹象显示在学习院有学籍。

22 根据《宫本百合子全集》别册所收《年谱》记载，《貧しき人々の群》是其第一部作品集。

还要在一二年前吧²³。这小说里描写农村中穷人的各样悲惨的生活，作者以地主家小姐的身份站在中间，看得非常难受，想要帮助没有力量，自己同时又受群众的歧视，感觉很是孤独。这里显然是受着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的影响，又在自己谴责处分有托尔斯泰的感化，在后来看去难免是幼稚的，但由此开头，她就走上了自己的道路去，不久忽然离开日本，往苏联去留学，她初期的文学活动就算完了。

《宫本百合子 二（饭后随笔三六八）》

百合子的丈夫宫本显治是共产党员，被日本政府根据不法的治安维持法捉了去，判处无期徒刑，其情形与现在的松川事件²⁴很相像，关了十二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才算放了出来。自一九四六至四九年间，她写了四部小说，我所见到的只是第一种，名叫《播州平野》。她用了石田广子的名字，叙述她从投降那时起看出日本改革有了曙光，后来知道她丈夫可以出狱，便奔跑各处，预备到东北〔为北海道之误〕的网走町去迎接他，播州平野便是她所经过的地方〔此时广子正从她丈夫的老家山口市赶往东京，途经位于兵库县

23 参见前注（21），文章《一つの芽生》发表在1918年1月，作品集《一つの芽生》在同年2月出版。

24 1949年8月，在位于现今福岛市松川町的东北本线松川站附近发生的列车脱轨、翻车事件。三名乘务员死亡。事件被认为是共产党员为反对日本国铁及东芝松川工厂的裁员而实施的犯罪。一审判决包括5名死刑在内的20名全体有罪，二审判决无罪3名、死刑4名，其他有罪。63年最高法院最终判定全员无罪。将其与下山事件、三鹰事件并称为战后美军占领时期所发生的阴谋冤罪事件的观点比较有力。周作人之所以认为宫本显治的无期徒刑和松川事件有相似之处，也许周作人是想主张这两起事件都是依靠权力对共产党进行镇压的冤罪事件。这样一来，周作人所获得的关于松川事件的相关情报就非常准确，而且可以说消息获取也非常的迅速。如果战后这一时期周作人能够很容易地阅读到日本报纸的话，因为《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会刊登被告的证言以及律师团的辩护等报道，那么在这个阶段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进行推测。举两、三个例子来说明的话，比如《朝日新闻》1949年12月6日的相关报道（根据朝日新闻数据库文藏Ⅱ）、《读卖新闻》1949年12月8日、1950年1月19日的相关报道（根据读卖新闻数据库ヨミダス历史馆）等等。此外，《人民日报》1951年1月12日刊载了《松川事件介绍》的文章并详细报道了“松川事件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吉田内阁有计划地制造的陷害日本共产党、进攻日本工人阶级的一个罪恶阴谋”。《人民日报》上月、本月关于松川事件的报道就超过了十次。正如后文所述，从《周作人日记》的记载可以推断周作人当时看过这篇《人民日报》的报道。而且，宫本显治不仅违反了治安维持法，在党内间谍调查事件中也因伤害致死罪等多个罪名被判无期徒刑并执行了服刑。

的播州平野]，这里以夫妇的感情为中心，记述各地民间对于旧日本的崩坏感到欣慰之情，是很有意义的事。我觉得更为重要的，乃是她对于妇女生活的关心，差不多可以说是同性的代言人，但也因此受到反动政府的嫉视，在日本法西斯势力存在的时间，她的小说一直不许可出版。本书第十五章中有四页的话说得很好，现在只能节述中间很小的一段落：

广子在小说里想要描写的女人的心情，差不多可以说就成为日本所有的女性的感情的主题了。可是有这一点，广子的小说无论如何都非得禁止不可。广子当作个人当作女人所要告诉的愈是真实，其所表现愈是为千万女性所共通的东西，那就愈不能不禁止，这就因为广子是为对于宣称为了天皇与爱国心与幸福的建设而进行着的战争表示不信的女人，因为是为对于侵略战争与加在民众生活上的破坏予以抵抗思想犯的妻子的缘故。广子的文学到了将要最真实地成为失掉了恋爱的年青的姑娘们的，失掉了生活的柱子的妻子们的东西的时候，她所写的一切东西就都不许发表了。

妇女不是一个阶级，但在解放完成之前，这需要当作一个阶级去斗争以求解放²⁵，这里很重要她们自己努力，才能有效，这时像宫本百合子这样的人便有很大的价值了。

四、周作人与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之关系——从《文学评论》杂志出发

在1930年代，鲁迅先生曾与中共合作并和日本无产阶级作家也有过交流（即

25 此段落周作人的措辞与一年前写给周恩来的书信《周作人的一封信》（原载《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中的以下部分看起来十分相似。原文如下：“有一个时间关于妇女问题的探讨，归结到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党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变更。”

使关系的内情较为复杂)。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周作人却自觉地和左翼政治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持如此态度的周作人在1930年代中期也曾与日本无产阶级文学派系的作家们有过一些为数不多的直接接触的机会。《文学评论》杂志曾在1934年10月号(第1卷8号)上刊载了藤森成吉写的《宴请周作人(周作人を招く)》²⁶一文。

1934年3月,就在日本纳尔普(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因遭受官警镇压而解体的同时,《文学评论》杂志随之创刊。据《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讲谈社,1977年初版)第五卷所收该杂志条目(第368页)介绍,“这本杂志反映了旧无产阶级文学家们根据纳尔普解体声明中所谓‘要转入通过以合法发行机构为中心、以创作团体为阵营的活动,这样才能为新形势下重新组织更具进步性的文学运动奠定基础’这一方针所做的相应努力。同时,在没有可供依靠的运动组织的情况下,该刊也成为文学家们各自展开活动的据点。单就这一点,这本杂志被视为在使旧无产阶级派作家融入昭和10年代文学语境方面起到了一种独特的作用。而就整体而言,该杂志在运动组织崩溃后不久不仅承担起了如同无产阶级文学家们营生支柱般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成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争的舞台。此外,在推动岛木健作等新人作家的出道方面也被认为具有重要意义”。该刊从1934年3月创刊至1936年8月因受压制而废刊为止,在渡边顺三和德永直等人主持下由ナウカ出版社前后总计出版发行了31册。

《宴请周作人(周作人を招く)》是一篇仅仅只有一页的短文。作者藤森成吉是众所周知的战前日本著名无产阶级文学家之一。1934年8月21日,藤森把正在访日²⁷的周作人,以及同事之友人且同样也身在东京的北京大学外文系日语科教授徐祖正邀请到他自己家中设宴款待。该文记录的正是举行欢迎会时的情景。日方出席人员除藤森之外,还有秋田雨雀、江口涣、神近市子、德永直、渡边顺三、岛田和夫共计六位。他们都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响当当的先锋成员。藤

26 此文章的存在与出处亦得益于早稻田大学商学学院小川利康教授提供线索。

森首先在对周作人进行介绍时说道：“周作人先生是中国著名作家鲁迅的弟弟，包括周健人〔为‘建人’之误〕先生在内有周氏三兄弟之高名。长年从事日本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工作，是日本文化和支那文化之间桥梁般的人物”。在介绍完其为人经历之后，还进一步介绍了周作人当天的发言。

周氏以平淡的口吻和大家聊了很多话。比如说道中国的现代文学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很大。

“鲁迅的文章之类的，也是借鉴了漱石和尼采而写的。”

“不过从翻译来看，鲁迅和漱石给人的感觉还是迥然不同啊。”不知是谁这么说道

“未必，漱石的反讽就……。”

据说在中国的现代读者群体中，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书要比资产阶级作家的书受欢迎。还说起爱罗先珂在离开日本去中国的时候曾在周家招待过他，以及当时发生的种种趣闻。

发言的主要内容大致如上。而在这一页的中央则放上了当天的大幅集体合影，每个人看上去都很精神。藤森在报导短文的结尾处说道“21日的小集，大家都很满意，认为这是近来难得的一次愉快的聚会。”让人感觉此言不虚。

虽然藤森宴请周作人何以能够成行的具体经过我们仍无从知晓，但若从与会

27 据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之记载，周作人于该年7月15日至8月28日期间，随妻子·羽太信子来日。此外，据此年谱与止庵所著《周作人传》（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记载，此次访日期间周作人不但与岛崎藤村、武者小路实笃等日本文学家展开交流，而且也与日本亡命中的郭沫行曾三度会面。据上述《年谱》（450页）记载，此乃徐祖正牵线介绍的结果。关于徐祖正与创造社的密切关系，请参见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11卷《两地书》（七一）的注释（1）。而且上述《年谱》（451～452页）还特别记述了此次周作人的日本访问受到了日本文坛的广泛关注，很多杂志和报纸都刊登了欢迎周作人的文章。其结果竟然出现了周作人作品译文的单行本。而关于此次访日期间与岛崎藤村的会面，周作人自己在岛崎去世的时候所写的《岛崎藤村先生》（《艺文杂志》1卷4期、1943年10月1日，《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八卷收录）中有所提及。周作人著、木山英雄编译的《日本谈文集》（平凡社东洋文库，2002年）所收的同篇日语译文的注（1）记述了周作人和徐祖正此次的来日目的是，“两人是为了北京大学外文系日本文学专业采买书籍来日的”。

者的角度来考虑，以下推测或许能够成立：参与者大多都是与这位1921年6月被日本驱逐，经由上海至北京后在鲁迅、周作人家中滞留了1年左右的爱罗先珂有着密切关联的人物。根据藤井省三著《爱罗先珂的城市物语（エロシエンコの都市物語）》（みすず书房，1989年）中所述，爱罗先珂在日本停留期间，曾与秋田雨雀、神近市子、片上伸、大杉荣等加深了交流。而藤森成吉、江口涣也参与过秋田、大杉等参加的日本首个社会主义大同团结组织—日本社会主义同盟²⁸。这些人脉关系经由爱罗先珂介绍给了周作人（当然，也包括鲁迅），加上一直以来周作人本身对无政府主义抱有的同情，从而引起了他对作为同时代日本文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关注。而提及江口涣，周氏兄弟二人一起编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²⁹中也翻译收录了其作品《峡谷之夜》，在附录“关于作者的说明”中也指出江口“曾经加入过社会主义者同盟”³⁰。此外，单是查阅《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就显示周作人对大杉荣的言及已达十二处之多，可见其关注程度之深。而神近市子与大杉之间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关系，由于感情上的纠葛神近曾刺伤了大杉的事件非常有名。因与下文论述的内容有所关联，在此顺要便提及的是，为新中国成立前后回到北京的周作人的翻译工作提供帮助的，恰恰是1922年2月陪同爱罗先珂一起从上海前往北京的随行人员—郑振铎和叶圣陶³¹，二人亦是周作人在文学研究会的同仁。

28 参见该著作4~6页。但另一方面，如前注所述周作人此次访日期间与郭沫若曾有三次会面，所以也有可能是经郭沫若引荐联系上了东京左连周围的中国左翼人士，又经由他们而与藤森、秋田等人联系起来（这与上文的推测并不矛盾）。关于当时活跃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学相关人士以及日本左翼文学家的动态，可参见小谷一郎著《1930年代中国人日本留学生文学・芸術活動史》（汲古书院，2010年）。

29 商务印书馆，1923年。封面、版权页的编译者只有周作人的名字。本文引自同年发行的再版本，但在再版的封面上可以看到“胡适校”的字样。

30 小川利康所著论文《中国語訳・有島武郎「四つの事」をめぐって—〈現代日本小説集〉所載訳文を中心に》（《大东文化大学纪要》第30号“人文科学”，1992年）对于该译文集的“关于作者的说明”中各个作者介绍项目的执笔者究竟是由周氏兄弟二人中的何人来担任之问题已基本考证清楚（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分类不正确）。但由于关于江口涣的说明仅仅只有短短两行，故而未能确定（《鲁迅全集》则判断由该作品的译者鲁迅来执笔）。

31 参见注27所引藤井省三著作，92、93页。

而翻阅《文学评论》本期的目录可以发现，文章作者、座谈会出席者的阵容与《宴请周作人》一文所列举的一样，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著名人士都榜上有名。只是排列顺序略有差异，比如江口涣、德永直、立野信之、川口浩、龟井胜一郎、窪川鹤次郎、森山启、松田解子、渡边顺三（以上为“作品讨论座谈会”参加者），汤浅芳子、村山知义、窪川稻子、而在小说中杨逵的《送报员（新聞配達員）》尤其引人注目。另外，江口涣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中国翻译及其译者（日本プロレタリア文学の支那訳とその訳者）》一文中，提及了芥川对出自鲁迅、周作人兄弟之手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出色译文的赞誉，还介绍了小林多喜二、中野重治、德永直、窪川稻子、藤森成吉等人作品的中文译文及其译者。而实际上，宫本百合子在《文学评论》杂志上也十分积极活跃。³²在这一期中，她不仅以中条百合子之名³³参加了上述的“作品讨论座谈会”，发表了题为《最近的感想（近頃の感想）》的评论之外，还针对该期刊载的应征小说入选作品《毒》（木村青治作）、《送报员（新聞配達員）》写了选拔感想并一起发表在《小说选稿结束之后（小説の選を終えて）》的短文中。当然，周作人曾获赠该期杂志，也肯定会读到这些文章³⁴。中条百合子的名字大概由此给周作人留下了印象吧。此外，由于周作人很早开始就对“妇女问题”抱有兴趣³⁵，故而考虑在更早的阶段他已经开始对中条（宫本）百合子就有所关注也不是没有合理性。如此贯穿看来，这种关注经过《佐藤女士的事》的酝酿，而与战后所写的《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二》、《日本民歌》一脉相承。

32 《增補改訂 新潮日本文学辞典》（1988年）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条目中有《文学评论》的介绍：（这与宫本百合子以及出狱后的中野、窪川的协助执笔有关）。

33 本论前文中已有论述指出，中条百合子将笔名改为宫本百合子的时间是在1937年。

34 顺便说明一下，根据中岛长文所编《鲁迅目睹书日—日本书之部》（1986年）记载，鲁迅收藏了《文学评论》杂志的全部三十一册。

35 周作人曾翻译了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发表于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此外，1922年8月还同胡愈之、周建人等一起组织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会”。

五、共产党情报局对日共的批判与周作人的《宫本百合子》

在本节，我们先来看看本文所介绍的《日本民歌》、《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二》三篇文章周作人在撰稿时自身所处的境遇和国际政治环境。从后来人的视角可以看出，这三篇都写于政治上十分微妙的时期。

周作人在中日战争结束后，被国民政府作为对日协力者于1945年12月在北京逮捕。1946年11月他接受了“汉奸审判”，最终被判处入狱14年（之后经上诉再审，改判减刑到10年）、剥夺公民权10年且没收全部财产（除去生活费），并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1949年1月，当时因国共内战而被逼至绝境的国民党政府决定释放日本战犯和“汉奸”。周作人于是被移送至上海而得以释放。在当年5月，周作人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³⁶，而8月回到北京之后就迎

36 虽然与本文论述主旨有所偏离且篇幅较长，但还想就1949年1月至8月周作人在上海滞留期间的经历在此简要记述。据周吉宜编《1949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中1949年6月3日条目所记载：“下午陈济川同何之瑜来谈，乃是北大出身，仲甫[陈独秀]之徒也。”根据胡金兆著《百年琉璃厂》（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与姚一鸣著《中国旧书局》（金城出版社，2014年），陈济川乃是北京古书画古董店街琉璃厂之老铺来薰阁的店主，与以鲁迅、胡适为首、包括钱玄同、刘半农等在内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都有过交流。此外，还与吉川幸次郎、长泽规矩也、服部宇之助、青木正儿、狩野直喜等日本中国学者也有交流，本人也曾亲自在战前数次访日，与日本的文求堂、临川书店等同行从业者也有联系。1930年代末期在上海开设了分店，在中日战争期间据说还曾帮郑振铎藏身于该店书库中。据陈福康著《郑振铎年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年）中册记载可知，郑振铎从1941年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特别是在1943年之前曾一度频繁地出入来薰阁。《胡适日记》（联经出版社，2004年）第八册关于1947年3月27日的条目中，也以自以为傲的口吻记录了从上海来薰阁的陈济川处以低价买入了明代黄省曾刻本《水经注》之事。

而关于与陈济川一同访问周作人的何之瑜，【廖应义塾大学日吉纪要·中国研究】第9号（2016年3月）所载笔者翻译的陈道同所著《何之瑜晚年的两件事》以及《陈独秀文集》（平凡社东洋文库，2017年）第3卷第4部《〈陈独秀最后的论文与书信〉译者题解》（长堀执笔，第3卷整体的解说由江田宪治执笔）都有详细的说明介绍。在此，仅就与本文相关之处简单引述如下。

何之瑜（1896～1960），字資深。湖南人。1918～1925年前后，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据郑超麟回忆：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担任中共湖南省湘潭地方委书记，1927年6月毛泽东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何之瑜曾在他手下担任组织部长，二人关系良好。大革命失败后，他与陈独秀一起转变为托洛茨基派，1931年5月在中国托派统一大会后被国民党逮捕，于1937年获释。从托派组织脱离后，抗日战争时期在四川江津接受北京大学同窗会的委托而照料晚年陈独秀的生活起居。1949年，与郑超麟等人以及中国托派少数派组织共同组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并成为中央委员。1947年年底至1949年9月，在上海与何之瑜同住过的陈道同（两人当时都是上海文华电影公司的职员）认为，何之瑜曾想利用与毛泽东的亲近关系而试图实现中共与中国托派之间的和解。十分无情的

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此期间，周作人在上海时就已经开始向其后刊载了《宫本百合子》等文章的《亦报》进行投稿。身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随后并没有进一步追究周作人的刑事责任，因此他虽然依旧背负着“汉奸”的污名，但却还是能在人民共和国获得一定的写作自由和生活保障。

是，在1952年12月因中共政府的托派清洗而被捕入狱。1960年死于毛泽东主政下的监狱之中。陈道同是托派分子陈仲山又名陈其昌的长子。其父陈仲山曾给鲁迅写信，并引发被视为鲁迅撰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实际由冯雪峰执笔）的问世。此信其后成为了“陈独秀、中国托派=汉奸说”的宣传文章。对陈道同来说，何之瑜是在抗日战争中被日本宪兵队秘密处死的亡父曾经的朋友和同志。

何之瑜在1942年5月陈独秀去世后立即组织葬礼、收集遗稿，在抗日战争之后曾为了计划从商务印书馆出版陈独秀遗稿集而向胡适求救，但未能如愿。最终，在郑超麟等托派的捐赠下私人出版了《陈独秀最后的论文和书信》（出版时期约为1948年末）。胡适阅读了何之瑜寄赠的该书，重新发现了陈独秀自由主义者的一面，于是撰写了解说长文。而该文后来作为“序言”，附录于1949年6月以广州的自由中国出版部之名，在删除了一部分的基础上发行的盗版《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中。《胡适日记》1949年2月23日的条目记载如下：“读《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深喜他晚年大有进步，已不是‘托派’了，已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

而从此处开始进入正题。胡适逃向美国是在中共军队解放上海前夕的1949年4月的事情。据《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版，1983年）记载，可以确认的是何之瑜至少在1948年11月6日之前就陈独秀遗稿出版事宜曾给胡适写信。何之瑜当时是一边身兼已重建的中国托派少数派组织、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的职务，一边与胡适保持个人交往关系。周作人在日记中写何之瑜乃是“仲甫之徒”，或许是因为周作人已知晓何之瑜是（曾是）一名托派分子吧。

至於陈济川与何之瑜的关系，前文提及的陈道同在其《何之瑜晚年两件事》中回忆道：“何之瑜从四川带回了一只木箱，内藏遗稿。这只木箱当年存放在一家名叫薰阁的古书画铺楼上。”也就是说，何之瑜在陈济川上海来薰阁分店存放了陈独秀的遗稿。何之瑜、陈济川二人关系的亲疏，可从此处窥得一二。何之瑜与胡适围绕陈独秀遗稿的出版计划直到1948年底都有过直接的交流，也由此可以认为陈济川与胡适也有过间接的接触。1947年3月17日的《胡适日记》中出现了陈济川，由此可以联想起1949年2月23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了胡适在读完何之瑜寄赠的陈独秀遗著后的读后感。在此前提下，反观《周作人年谱》7月28日的记载条目，在当天的《亦报》刊载了无署名的文章《胡适之硬拉周作人》。其中写道胡适在前往美国之前，希望在上海与周作人会面，但遭到了拒绝。其后接着写到“后来胡适又托人劝周作人南下，力保无论道香港去台湾，一定有教授位置。周却对来人笑谢，说我当年苦住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开上海，难道自居白俄，还是自称政治垃圾？”《亦报》是当时周作人主要的投稿对象，一般认为周作人与该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估计周作人是这篇报道最终的信息来源。《周作人日记》1949年6月3日条目中出现的何之瑜、陈济川，从当时二人与胡适的关系来看，也可能是《亦报》所说的胡适委托去说服周作人的“人”。当然，从何之瑜与陈独秀的关系以及陈独秀与周作人的久远关系来看，何之瑜去拜访周作人也并不奇怪。但考虑到是数月前曾就陈独秀遗稿出版问题与胡适合作过的何之瑜、陈济川二人同时去拜访周作人，以上的推测也或许能够成立。此外，陈济川在该年度《周作人日记》中包括6月3日之外，其后还曾出现过五次。同年8月回到北京的周作人也在9月28日去来薰阁找过陈济川。

由于篇幅的关系，对此二人的说明就到此为止。关于此问题笔者将再补充其文献资料另撰文专门讨论。

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³⁷的《我的工作（三）》一文中如下写道：

1950年1月承蒙出版署署长叶圣陶君和秘书金灿然君的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是来叫我翻译书的，没有说定什书，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过了几天，郑西谛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本，我便根据了这个来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

叶圣陶³⁸是1920年代周作人和鲁迅也曾参加过的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之一，也是著名的小说家。1950年1月，他当时官至能一手掌控出版物的出版总署副署长（署长为胡愈之）。郑振铎也是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之一的学者和编辑，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³⁹。如此因缘际会之下，周作人受到了承担希腊语翻译工作的高度期许，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付二百元（随后调至四百元）的高额工资。前文所引木山英雄著《周作人“对日协力”始末（周作人「对日协力」の顛末）》书中引述了唐弢先生的如下证言。

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

37 香港听涛出版社，1970年刊行。

38 据商金林著《叶圣陶年谱》第二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记载，叶圣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10月20日，出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而据该书第三卷（同上，2005年，第4页）所载叶圣陶1950年1月23日日记片段，有如下记载（[]内为笔者按）：“[午]饭后两时，偕乔峰[指弟弟周建人。建人第一任妻子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之妹羽太芳子。此时，已与芳子离婚逾三十年][金]灿然访周启明[周作人]于八道湾。启明于日本投降后，以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拘系于南京，后不知以何因缘由国民党政府释出，居于上海，去年冬初[周作人实际于去年八月返京]返居北京，闻已得当局谅解。渠与乔峰以家庭事故不睦，来京后乔峰迄未往访，今以灿然之提议，勉一往。晤儿时觉其丰采依然，较乔峰为壮健。室中似颇萧条，想见境况非佳。询其有无译书计划，无确定答复，唯言希腊神话希腊悲剧或可从事，但手头参考书不备，亦难遽为。盖其藏书于拘系时没收，[现]存于北平图书馆也。谈四十分钟而辞出。”与《知堂回想录》的记载相比，二者口吻的微妙差异意味深长。特别是，在叶圣陶的日记中记载了周建人与叶、金一同前去拜访。而《知堂回想录》中却丝毫未提及周建人的来访，起因应源自叶圣陶所说的兄弟二人不睦。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

这里所说的毛泽东读到的写给周恩来的书信，是指周作为自己的“对日协力”进行辩解而被认定写于1949年7月4日的一封信。过了四十余年之后，最终在《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以《周作人的一封信》为题得以公开。收件人姓名为空，周作人在信中表明了这封信本应寄给毛泽东，但为了避免给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添麻烦所以就没写抬头的缘由。因此，最终这封信才被转交给了周恩来。关于这封信的详细原委，请参考木山英雄著作的附录《周作人致周恩来书简、翻译及题解（周作人の周恩来宛書簡、訳ならびに解題）》、以及王锡荣著《周作人生平疑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所收文章《毛泽东对周作人信作过批示吗？》⁴⁰。

此外，木山著作的附录中还收录了文洁若的文章《晚年的周作人》（《读书》

39 据陈福康著《郑振铎年谱》下册（山西出版集团三晋出版社，2008年，709页）记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1月1日文化部正式成立，政府任命郑振铎为文化部文物局长。当时，郑振铎正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等多项国家公职，而与出版方面有直接关联的职务大概就是文物局局长。此外，郑振铎曾将自己对于周作人成为对日协力者事件所持的心情在《惜周作人》一文中很好地表达出来。阅读此文就能理解新中国时期郑振铎对周作人提供的帮助。本文参考了郑振铎《蛰居散记》的日语译本，安藤彦太郎、斋藤秋男译《書物を焼くの記》（岩波新书版，1954年）。（译者补注：郑振铎著散文集《蛰居散记》于1951年由上海出版公司作为“文艺复兴丛书”之一种印行单行本。作者在写于1945年8月20日的《自序》中，言及此书撰写目的是要将蛰居期间的所见所闻，用散记的形式写出来，“可以使将来的史家们仍有些参考”的。这一组写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间的系列“散记”，最初连载发表于柯灵、唐弢上海主持的《周报》上。1951年初刊之后直至1982年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之一种重排印行。再版时由编者从《周报》上补充辑入了《记陈三才》、《惜周作人》、《一个女间谍》、《记平祖仁与英茵》4篇。这些是当年做为《蛰居散记》系列在报刊上发表而在出版单行本时由作者删除的篇目。1983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郑振铎文集》之时，亦将《惜周作人》等4篇作为《蛰居散记》之《补遗》收入。1954年，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与斋藤秋男直接根据《周报》上连载原文逐篇翻译了《蛰居散记》，并将其中一篇《烧书记》换作全书的书名，由岩波书店出版。本文作者所参照的日译《惜周作人》一文就收录于此日译版本中。）

40 王锡荣曾针对倪墨炎批判唐弢之文而提出周作人写给周恩来书信的真伪、有无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驳斥了倪墨炎的论说。此处虽然不能详论，但笔者大致赞同王锡荣的论述并借其观点来支持本文的立论。

1990年第6期)。她是作家萧乾之妻，曾在1950年代末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日本文学方面的编辑。据此文所言，周作人在1952年8月之后成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希腊与日本古典的特约译者。而自1958年开始，文洁若则成为了该特殊业务的责任编辑。在文中，文洁若还穿插披露了一些到周作人家访问时候的小插曲。

不过，唐弢在文中并未明确指出他是何时从周恩来处听到的消息，以及毛泽东又是何时读到了周作人的书信。但从上述周作人的回忆以及书信的落款日期来看，很可能是在1949年秋至12月上旬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发生的事⁴¹。在接到毛泽东读过周作人来信后所做的“让他做翻译工作”这一指示之后，可以想见1950年1月叶圣陶赴周作人家访问以及郑振铎为其准备伊索寓言的双语本便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了⁴²。这大概也促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周作人之间“特约”关系的达成。虽然文洁若所说的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但从前述的相关证言中可以想见，实际上早在动笔写《日本民歌》、《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二》等文章的1951年初，周作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能够通过朋友、出版社工作人员等渠道接获取日本同时代信息的境遇。正如他自己在《宫本百合子》文中所说的他是从新华社新闻中获知的消息。由此也可以认为他当时能从各种中国媒体中获知日本的相关报道。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读过《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因为在《1949年周作人日记》⁴³8月23日的条目中可见“今日起定阅人民日报”的记载。

41 此外，据中共中央文献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记载，毛泽东于1949年12月6日乘专列离开北京，16日抵达莫斯科，为签署中苏友好同盟相互援助条约而在莫斯科停留了两个多月。直到次年的1950年2月17日才离开莫斯科，视察中国东北部后于3月4日返回北京。毛泽东对周作人待遇做出指示应是在苏联访问的前后，如果将1950年1月叶圣陶对周作人的访问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出访之前的可能性则更高。前述王锡荣论文考证指出，胡乔木写给毛泽东的书信（1951年2月24日，《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61～62页）内容表明周作人曾在1951年2月给毛泽东写过第二封信来表达相同的诉求。本文只涉及最初第一封写于1949年的书信。

42 参见王锡荣著（注39）第362页。

43 周吉宜编《1949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7期。

以上的考证是为了想要确认周作人在《日本民歌》、《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中言及宫本显治之时，究竟对当时的日本以及日本共产党的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进一步而言，也是为了验证 1951 年年初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日本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动态对周作人写作此文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实际上，周作人撰写上述三篇文章的时候，这位宫本显治正处于日本共产党所谓 1950 年分裂的最激烈时期，而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这场实际由苏联共产党主导的共产党情报局（全称欧洲共产党·劳动者党情报局）对日本共产党的批判所引发的骚动，与中国共产党也有很深的关联⁴⁴。

1950 年 1 月 6 日，欧洲共产党·劳动者党情报局在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发表了《关于日本的形势》一文，点名批判了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野坂参三的美国占领军（＝解放军）规定及其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论。由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组成的日共政治局在当月 12 日刊行的《赤旗》上发表了《对于〈关于日本的形势〉之所感（「日本の情勢について」に関する所感）》（下文简称“所感”一译者注），反驳了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并指出他们已经通过实践来克服了日共的错误。然而，中共在 17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载了《日本人民解放之道》，指出野坂的论文“其中是含有严重的原则错误的”，“热切地希望”日共中央不仅要“纠正”在《所感》一文中表现出的态度，更须要“日本共产党能够接受共产党情报局的批评”。日共中央从 18 日开始召开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形成了以德田、野坂、伊藤律、志田重男等为主流对《所感》基本表示支持的所感派和以志贺义雄、宫本显治、神山茂夫等为代表的对共产党情报局批判表示全

44 下文关于共产党情报局批判以及日共的 1950 年分裂的记述，是笔者在参阅加藤哲郎《トピック・コラム日本共産党とコミンフォルム批判》（岩波讲座东亚近现代通史第 7 卷《アジア諸戦争の時代 1945-1960 年》，岩波书店，2011 年，120～121 页）以及小山弘健著、津田道夫编、解说《戦後日本共産党史—党内闘争の歴史》（こぶし書房，2008 年），《人民日报》消息，田川和夫著《日本共産党史》（现代思潮社，1960 年），《德田球一全集》第六卷《德田球一年譜》（五月书房，1986 年）等不同作者在不同立场下所著的诸多文献资料基础之上整理而成。

面支持的国际派这两大阵营的对立。但在19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劝告之后，发表了接受共产党情报局批判的声明。然而，这两派的对立却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进而发展成不可扭转的局面。另一方面，在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译者注）下达了革除日共中央委员的命令，随后不久这一指令就在当年秋天演变成了清共（Red Purge—译者注）的内阁决定。日共中央在主流派和国际派持续对立的情况下，德田等主流派非公开化地将中央委员会据为己派，在7月设立了临时中央，更鲜明地表现出了要将作为支流的国际派排除出去的姿态。在此事态下，7月7日中共又再度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日本人民斗争的现势》，指出“日本民族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发展，要求日本共产党在任何条件下继续存在，并团结一致地进行正确的斗争”，消除对立，谋求党内统一。9月3日，中共在进而又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现在是日本人民团结对敌的时候》，指出“从今年1月以来它已经改正了它的错误。在此以后，它所执行的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正因为这样，美国占领者及其走狗日本反动政府才对日本共产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无耻的‘整肃’。”一方面，表示了对主流派的支持，对非主流的支派行动和“左翼冒险主义”进行了批判。另一方面，建议主流也要注意倾听党内不同意见，争取再度达成统一。然而，国际派内部的一部分在中共的劝告下态度也走向软化，但主流派始终没有改变其强硬的姿态，最终寻求统一之举并未获得成功。而在次年1951年的8月，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共一样对日共主流派针对支派所做的决议表示支持，使主流派的主导地位获得决定性的巩固，而日共内部国际派的诸多组织都被解散。在经历了德田指挥部亡命中国（1952年12月）后在北京的组织重建以及德田客死异乡（1953年10月）等事件之后，党内的对立持续贯穿了从1951年至1954年的武装斗争时代。最终在1955年的六全协会上，由于宫本显治等非主流派重返指挥部才渐次结束了党内分裂的混乱局面。

这里须要引起注意且前文也已稍有提及的是，此次共产党情报局对日共的批判正好发生在毛泽东的苏联访问期间。加藤哲郎对此指出：

（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使相当于欧洲情报局的东方情报局，虽然在亚洲并未成立组织，但却是将亚洲各国的共产党纳入统合到苏联世界战略的重要一环。……而这一系列动作，全部都是在1949年12月至50年2月毛泽东苏联访问期间推动的。毛泽东按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苏联获得了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作为交换他与斯大林约定将会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意愿来对朝鲜劳动党、日本共产党、越南独立同盟等进行指导或协调。在50年6月由于北朝鲜军队南进而引发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义勇军的参战就是这一约定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在日共1950年分裂之际对日共所做的劝告，应该视为与这一系列以苏联为盟主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动向有紧密关联，同时也是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亲自参与的结果。

接下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这一“作为友党的劝告”与宫本显治的行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矛盾之处抑或又是如何整合统一的呢？最先是1950年1月6日共产党情报局的批判，随后12日德田指挥部发表《所感》文章，接着18、19两日召开的日共中央会员扩大会议上接受了17日中共针对《所感》的批评，在此过程中宫本等人是站在了相对更加忠诚的立场上来面对情报局对日共的批判。但在此之后德田指挥部马上把宫本排除出了中央委员会，将其下放去九州担任地方议长。到此时间节点为止，宫本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基本一致的。不过，到了宫本成为了国际派的主要人物并开始展开党内斗争的9月，中共虽然表明“现在正是日本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抗敌的时候”，但实际上中共却对日共主流派表示了支持并批判了国际派的分裂行动。但即便如此，日共统一也没有取得进展，国际派的诸团体则谋划12月份在全国范围内重新集结。这样一来，在中共看来宫本就自然成为了应该受到批判的日共内部支派的领导人。然而，中共贯穿1950年整个年度针对日共分裂局面所秉持的基本立场，是希望日共在接

受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基础之上（即遵循苏联共产党的指示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基础上，进一步换句话说即是在承认并拥护两党利益优先基础之上）实现内部的团结与统一。基于此立场，所以中共基本上认可国际派的领导者还是属于要去号召统一的对象。但是，日共主流势力将反对派排除在外，于1951年2月23日至27日期间强行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协议会（四全协），通过了军事方针以及针对支派主义者所做的决议。决议而面向全党提出了将武装斗争作为当前面临的现实课题，一方面针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共共产党默许的希望日共能在朝鲜战争中美军作为后方基地的日本进行后方扰乱的要求进行了回应，另一方面决议确定了将日本共产党内部的非主流派、国际派和中立派都定性为间谍、挑衅者。而到了8月12日，共产党情报局在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上对这次四全协决议表示了支持，于是这也成为了来自共产党情报局亦即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日共主流派予以支持的最终裁定。对于国际派而言，这一阶段的“失败”也变得无可挽回。在此之后，在苏联与在中国友党看来，日共内部的支派活动就成为了“反党分子”与“叛徒”的行为。

那么将话题再次回到周作人身上，如果在上述这种国际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景下对《日本民谣》、《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1951年1月21日、2月1、2日）进行重新观照，就会发现这三篇文章对宫本显治的言及都发生在极其微妙的时期。虽说提及的必然性当然是因为宫本百合子去世这个很偶然的因素，但是能够毫无问题地提及宫本显治，就1951年的情况而言或许仅限于8月共产党情报局做出最终裁决以前的这段时间。而事实上，仅就《周作人散文全集》的索引卷来看，在这三篇之后周作人的作品中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宫本百合子、显治夫妇登场的文章。虽然对于周作人而言，或许在此之后再也没有了言及二人的必然性。但即便是有，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从政治形势来看触及这个话题大概也是不能容许的（当然，虽然从1955年日共六全协上宫本显治恢复权利到文革前夕日共产党的决裂为止的期间之内也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周作人在此期间内去言及宫本的必然性恐怕就更是少之又少了）。

虽说，不能完全认定在1951年初，周作人就已经全面了解了当时日本共产党的状况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对日共的批判背后与中国共产党的关联。然而，在《宫本百合子》文中周作人确实提到从新华社新闻中得知了她去世的消息。而且如前所述，周作人也确实在1949年8月23日之后订阅了《人民日报》。所以，关于日共1950年的分裂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最低限度而言周作人对刊载在《人民日报》上的情报消息是了解掌握的。此外，周作人不仅有叶圣陶、郑振铎以及其他的好友、熟人关系，还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途径，可以说有着非常广泛的信息来源渠道。《日本民谣》一文中对松川事件敏锐、及时的言及就值得关注。日本战败前夕所写的《关于佐藤女士的事》虽另当别论，但在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日本民歌》、《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这三篇中，不仅提及了宫本百合子、显治夫妇，而且对日本共产党进行了肯定性地记述而对日本法西斯分子予以谴责。这些言行，既是因对日协力而饱受非议的周作人为自己进行的雪耻，同时也或许是精明的他在自觉地向中国共产党政权表明其恭顺之意。而在1952年之后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特约译者这一身份此时尚未获得，并且共产党政权对自己的方针待遇也还没有明确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周作人此举还是有其相应的特殊意义。幸而因为周作人很早开始就对宫本百合子有了关注，故而上述三篇并没有使周作人内部产生心理纠葛。可以说使他在回避错开了所谓其言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外界批评的同时，又使其实现了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可能。

六、结语

1951年周作人所写的《日本民歌》、《宫本百合子》、《宫本百合子 二》三篇短文，言及了日本战败后因非转向而在网走监狱服刑出狱后的宫本百合子之夫、宫本显治的状况。在当时从日本获得的直接情报有限的情况下，周作人还是通过中国国内的媒体、利用人脉关系等了解情况并对其进行了正确地记述。而另一方面，在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即便在所谓两国间交流的整体信息量与交通往来量都大大增加的便利条件之下，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以及沿袭此版的

2005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在注释中都将宫本显治误注成了宫本百合子。我们不禁意识到，这种对比反映出了从日本战败后到日中恢复两国邦交之间的长时段内以及日中两国共产党自1966年以来较长时期的对立、断交的历史进程。从中我们也能看出国际文化交流中的盲点是如何形成的某种典型范式。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成为了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⁴⁵的周作人，才会被赋予一种从隔岸远观的角度去记录中日战争的悲剧、并勾勒这些可谓是随之相伴而生的文化盲点的历史使命。

（附记）本论文为科研费基盘研究项目（C）“周氏兄弟与‘新青年’集团（周氏兄弟と「新青年」グループ）”（2017～2019年度，项目负责人：小川利康早稻田大学教授，项目合作者：长堀祐造），以及2017年度庆应义塾大学学事振兴资金（个人研究B）的阶段性成果。谨此向为本文撰写提供重要材料线索的小川利康、王俊文、袁一丹三位老师表示感谢。

45 引自藤森成吉《周作人を招く》，载《文学评论》（参见注25）

补注：本文脱稿后，经本校经济学部王俊文讲师介绍，首都师范大学周作人研究专家袁一丹副教授为笔者提供了新近出版的《掌故》第四集（2018年10月25日）上陶洁所写《我们的通讯早已有些“越轨”——我的父亲陶亢德与周作人先生》一文的复印件。虽稍显繁琐，但据此最新文献，笔者在此愿为注（35）稍做补充。

陶亢德是一名与周作人关系甚深的编辑，他自身亦有因“对日协力”罪名而入狱的经历。他是《周作人日记》1949年度记录中出场最频繁的人物之一。陶洁此文主要以周作人致陶亢德书信为线索而论述了其父与周作人的关系。在此，笔者仅就与注（35）相关联的三个方面做如下补充说明：

一、关于《亦报》1949年7月28日的报道中称周作人“曾以苏武自况”。

据考证该说法出自于1937年9月26日周作人写给陶亢德的书信（《掌故》第四集，121页）。参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七卷所收《与陶亢德书五通》之五。初刊于《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

二、关于《亦报》1949年7月28日的报道中周作人未接受胡适南下劝告之事。

陶文记载了周作人与陶亢德关于此事的书信往来（123页），与《亦报》上相关报道文章的大致方向保持一致，故而侧面证实了该报道的可靠性。并且，从二人的往来交流可知（如果完全相信陶亢德的原话），胡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夕向周作人发出退避劝告的中间人并非陶亢德。这也从侧面使何之瑜、陈济川为中间人之说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

三、关于本文“《亦报》是当时周作人主要的投稿对象，一般认为周作人与该报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估计周作人是这篇报道最终的信息来源”之推测。

据陶洁文章介绍，正是陶亢德把周作人介绍给了唐云旌开设不久的上海《亦报》（129页）。由此，前文推测亦可得到补充加强。